

18.04

战斗在黎明前夕

——中共湖南衡阳工委(两衡工委)
地下斗争史料汇编

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编

战斗在黎明前夕

——中共湖南衡阳工委(两衡工委)

地下斗争史料汇编

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编

1992年5月

封面设计：黄福才

战斗在黎明前夕

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编

*

衡阳日报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衡阳日报印刷厂印刷

准印证：湘衡准(1992)37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字数：115000 印张：4.8125

1992年5月印刷 印数1000

(内部发行)

序

苏建民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的热潮中,原中共湖南衡阳工委(两衡工委)的同志撰写了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一大批史稿,并汇集成《战斗在黎明前夕》这本册子奉献给广大读者。该书对我们学习和了解衡阳地方党史,加深对党的热爱,构筑反“和平演变”的思想“长城”,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自古以来,地处两广咽喉的衡阳,乃兵家必争之地。在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在此,妄图作垂死挣扎。要在这里建立中共地下组织极不容易,开展地下斗争则更加艰难。然而,为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新世纪的曙光,中共湖南衡阳工委终于出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并与湘南衡阳工委、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等地下党组织相互配合,卓有成效地领导衡阳人民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三反”斗争,抗粮、抗税、抗征(兵)的“三抗”斗争,策反斗争,武装斗争以及护路护厂护城、迎解支前等一系列斗争,为衡阳乃至临近各县的解放,做了大量工作,有的同志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读过《战斗在黎明前夕》，我陷入了深沉的思考：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最后较量的历史关头，在黎明前的最后搏斗中，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斗争环境是极其险恶的，革命者不得不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开展活动，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勇往直前呢？信念！坚信自己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事业是崇高的，坚信共产主义必定在中国取得胜利。这个信念就象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使他们赴汤蹈火而毫不犹豫。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政权，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不也同样需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吗！

追忆昨天，是为了思索今天，展望明天。40多年前中共湖南衡阳工委（两衡工委）的斗争已成为历史。那是一部光辉的历史。历史是不应该忘怀的。当年衡阳工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地下工作者出生入死的坚持在黑暗中苦斗，这雄辩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经得起胜利与挫折，高潮与低潮，顺境与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无愧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富有革命创造精神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奋斗并做出最大牺牲的党。它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前途的希望所在。我们牢牢地记住昨天，将会更加自觉地坚持和拥护党的领导，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迎来更为光辉灿烂的明天。

目 录

序 苏建民

中共湖南衡阳工委(两衡工委)斗争史略

..... 《史略》编写组(1)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衡山县工委 谭安猷(22)

粤汉铁路党总支地下斗争纪略 童谦瑞(35)

占据新闻阵地 开展地下斗争 李楚凡(55)

解放前夕衡阳统战工作二三事 刘国安 卢其超(69)

回顾湖南衡阳工委领导的学生运动

..... 王继才 曹荣(77)

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五支队(一团队)战斗史

..... 李建元 蒋骥(87)

投身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 袁怀德(105)

回忆武工队东安小分队..... 雷扶超(119)

中国新民社在两衡地区的斗争..... 欧阳滋(128)

中国新民社衡阳扶轮中学分社革命活动纪实

..... 韩志平(135)

地下职工会的建立及其斗争..... 吴绍宣(142)

中共湖南衡阳工委 (两衡工委)斗争史略

《史略》编写组

一、衡阳工委的建立和发展

衡阳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衡阳市的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党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派遣骨干来此,领导和组织当地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1944年8月日军侵占衡阳之时,城区几乎被夷为平地,群众纷纷逃离,党的力量全部撤出了市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迫切需要重新恢复党在衡阳市的工作,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对此十分重视,从1946年春开始,先后派遣一批党员干部来到衡阳。

最先由湖南省工委陆续派到衡阳来的党员干部是何大群、刘善述、陈静山、刘秀颀等人。何大群于1946年春奉调到衡阳,当时的落脚点为衡阳县长乐乡清潭小学。清潭小学是省工委在衡阳的重要据点,清潭支部从1939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地下斗争,何大群在清潭小学的公开身份是学校教师,党内职务是特派员,直归省工委领导,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引起敌特怀疑,转移到宁乡和长沙两地。1947年春,省工委又将其调入衡阳市,先在衡阳市粤汉铁路局扶轮中学当教员,党内职务是衡阳市特派员,领导衡阳市地下

党的工作。何去扶轮中学之前，刘善述、陈静山就已在该校任教。刘善述于1946年上学期、陈静山于1947年2月先后经省工委派来衡阳。何到扶轮中学后，与刘、陈接上了关系。1947年省工委又将刘秀颀从长沙派回衡阳到湘桂黔铁路局子弟小学复职。这些同志进入衡阳市后，本着“稳扎稳打、积蓄力量、长期隐蔽、以待时机、坚持斗争”的方针，建立了据点，恢复了党的活动。在党的建设上最初采取“只播种，不发芽”的办法，以老师的身份对学生进行人生观的教育，启发青年学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部分进步学生在他们的启发下提高了觉悟，个别积极分子成为党在学生中进行工作的依靠骨干。通过这些骨干，在学生中发起建立进步社团，广泛联系向往进步的青年学生，并以社团名义出墙报，组织学生撰稿。墙报成为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园地，并起了扩大宣传、扩大影响的作用。经过一段工作之后，开始发展个别党员。1947年在中学生中发展曹荣为党员。曹荣入党后按照刘善述的指示，在道南中学建立学生社团“真理学术研究会”，研究会引导一批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青年学生文益谦、刘正平、王元吉、罗思义、罗立洲、欧阳镇相继被接收入党，成立了党小组，曹荣为负责人，于是在道南中学建立了党的据点。

刘善述除在铁路中学开展工作外，又在铁路局机关与部分刚从大学毕业，有进步倾向的青年技术人员发生联系。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于1947年下半年先后接收曹森、童谦瑞入党。曹森不久调去上海工作，童谦瑞就成为党在铁路局开展工作唯一的骨干力量。曹森、童谦瑞入党前在铁路局工务处搞了一个非正式的同仁俱乐部，叫做“大家唱”。通过这个形式联系了一批青年技术人员，从中发现了部分志同道合者。童谦瑞入党后便按照刘善述的布置，对他们进行工作，于1948年初又在工务处发展了两名党员。随后又采取个别联系的方式，先后在会计处和总务处发展了个别党员。赵勋原系

湖南大学学生，到衡阳铁路机厂工作后，于1948年秋在衡阳入党，组织关系也由地方转入铁路局机关，与童谦瑞联系。

与此同时，在新闻界也开展了建立组织的工作。1947年12月省工委派党员李楚凡到衡阳。抗战时期，李曾在衡阳《力报》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大刚报》和长沙《新潮日报》工作。到衡阳后，先在《精诚报》任采访主任，1948年1月与刘善述同志接上关系，受刘直接领导。刘交待李的工作范围是衡阳新闻文化界。李所在的《精诚报》系四开小报，发行量较少，影响不大，后转入衡阳《力报》任副刊编辑主任。此时，曹荣同志也转入《力报》任校对，于是在新闻界亦建立了党的据点。

以上这些同志就是何大群、刘善述等同志在衡阳市区恢复党的活动期间为党的组织播下的种子，后来成为衡阳工委最初的基层组织的领导骨干，使衡阳工委一成立就能顺利地开展工作的。

何大群、刘善述同志在衡阳市工作到1948年6月。何大群因工作需要先调离衡阳市。何离衡后不久，刘善述因被敌特跟踪，省工委令其撤离前往岳阳。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交代关系，甚至连他自己的未婚妻也无法告别。他直接领导的党员一度与组织中断了联系。他们两人撤离衡阳后，省工委决定另派干部前来领导衡阳市党的工作，向华南分局要求派遣熟悉城市工作、学生运动及统战工作的干部前来。黄道奇同志即系在这种情况下，由省工委于1948年8月派来衡阳的。黄道奇原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党员，1946年底1947年初响应广东党组织的号召，联络湖南籍革命学生回湘开展武装斗争，直接与设在香港的华南分局联系。据黄道奇同志回忆，当时湖南有邵阳、辰溪、慈利、东安4处武装起义的据点，特别是邵阳、东安的武装迫切要求马上起义，黄为此多次被召去香港汇报并要求批准起义，主要因群众条件不够成熟未获批准。及至1948年夏，华南分局召他去香港，对他说：“你的任务改变了，

组织上已决定你不搞武装。现在湖南急需搞城市工作，特别是搞学生工作的同志去。组织上已决定将你及其他一批同志的关系转到湖南省工委，听候另行分配任务。至于武装能否起义由湖南省工委决定。”黄回湖南后不久，即被安排在长沙余志宏家与省工委书记周礼直接会面（余志宏亦系中山大学的学生党员，时在长沙工作）。周礼同志与黄作了多次长谈，仔细地听取了黄道奇同志关于重庆、广州学生运动的情况与体会的汇报，然后分配黄道奇同志负责衡阳市党的工作。周礼同志明确交待黄：“你到衡阳的任务主要是做城市工作，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由你原来负责的邵阳、辰溪、慈利3处关系都交省工委，只东安的关系无人接，仍由你联系，但不起义。”关于地区的划分，周礼同志明确指出：“上级决定，为了更严密地保护党的组织，以衡阳为界，衡阳以南归广东五岭地委，以北归省工委。湘南决定开展武装斗争，暂时把湘南地区划归五岭地委领导，是为了保护党的城市工作。衡阳工委以城市为中心，以铁路交通为重点，加强党的领导，开展革命斗争。”黄道奇同志于是受命于是年8月中旬赶到衡阳市，根据周礼同志的指示，组建衡阳工委。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三青团机关报《弘报》的主笔和衡阳县中的兼课教师。

随后不久，省工委又将从广州回湘的刘国安同志调来衡阳。刘系1938年4月入党的。时省工委在衡山师范建立了党的组织，他是第一批发展的党员，一直由省工委领导，在衡阳一带活动。抗战时期，衡山师范从衡山撤到衡阳渣江，刘就与公开成立的衡阳县委建立了联系，离开衡师后又曾在南岳游击干训班受训一段时间；八路军办事处迁来衡阳，他亦在该处工作，并在《开明日报》工作过，后又往返桂林、冷水滩一带。1944年起周礼同志派他在邵阳、东安一带打游击。刘不仅对衡阳情况熟悉，并掌握了包括衡师特别支部在内的若干党员关系和一些进步社会关系，抗战胜利后，奉调到长

沙筹建长沙市工委，因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才撤去广州。这次重新调回衡阳，以加强党对衡阳市工作的领导。据刘国安同志回忆，当时周礼同志向刘交待：“衡阳市的工作以黄道奇同志为主，黄为书记，你协助，你过去的关系继续保持联系、指导。”刘到衡后，最早的公开职业是衡阳县民教馆的干事，后又兼含章中学、衡阳县师范学校的教师。

1948年10月，经省工委正式批准成立衡阳工委，由黄道奇、刘国安、刘东安组成，黄道奇为书记，刘国安为副书记，管辖衡阳、衡山的工作。为了加强工委领导，便于开展工作，工委领导人作了适当分工，黄道奇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并分管铁路、市区及新闻界的工作，刘国安同志除协助管城市工作外，与衡阳市周围各县过去的关系继续保持联系和指导，刘东安负责衡山县党的工作。同时，为了发挥党在基层的组织作用，尽可能将分散的10多名党员组织起来，根据工作性质和联系方便，相继成立粤汉铁路局支部，由童谦瑞、袁树椿、赵勋、刘友青、顾丽芳等人组成，童谦瑞任书记；新闻界由黄道奇、李楚凡、张华廉、张寄庵等人组成新闻支部，支部书记由张华廉担任；学校由刘秀颀、曹荣、文益谦、刘正平、罗思义、罗英、刘剑平等组成支部，刘秀颀任书记。各基层支部在工委领导下开展斗争。通过斗争，党在铁路、新闻、学校等各个方面的力量均得到发展，而且还在其他方面建立据点、发展党员，开辟了新的阵地。至1949年省工委召开“五月会议”时止，市内共有党员30多名，衡山县区共有党员26名。此外，还发展了部分团员，粤汉铁路成立了团支部，鹿玉章为支部书记。粤汉铁路局和邮局还建立了党领导的地下职工会，路局发展会员100多名，邮局发展会员30多名。地下职工会在后来护路护局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省工委“五月会议”后，为更有力地领导衡阳、衡山的工作，将衡阳工委改为两衡工委。此时，黄道奇因形势需要撤离市区，转移

衡阳西乡主持武装斗争。两衡工委改由刘国安任书记，黄道奇为副书记。同时成立衡山县工委，刘东安为两衡工委委员兼衡山县工委书记，熊家宽为县工委副书记，谭安猷为县工委委员，洙南区工委亦归其领导。两衡工委根据省工委“五月会议”精神，坚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铁路工作为重点的方针，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衡阳周围农村工作的领导，在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配合城市工作，更好地完成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任务。8月初，长沙接近和平解放，洙南一带敌军妄图顽抗，交通必将中断，为了便于联系，省工委决定两衡工委复为衡阳工委，以洙河为界，将衡山县工委划归省工委直接领导，洙南区工委仍归属衡阳工委。此后，衡阳工委委员有刘秀颀、童谦瑞和卢其超，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城乡开展迎解斗争，直至衡阳解放。

二、以城市为中心，以铁路交通为重点，开展斗争

衡阳工委成立时期，由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这两条战线上的胜利，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包围之中。但是不甘心灭亡的蒋家王朝，在临近崩溃之时还要对人民实行疯狂的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194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党在国民党区的工作“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省工委的具体部署，衡阳工委在城市工作中采取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的策略开展各方面的斗争。

铁路交通是衡阳城市工作的重点。工委成立后，黄道奇与童谦

瑞直接联系。黄要求粤汉铁路局的同志到群众中去开展活动，可以从一般的群众活动如团拜开始，去与群众交朋友。俱乐部不要光办成红色的，要用合法的作掩护去做“非法”的事情。按照这个要求，童谦瑞同志利用“大家唱”的活动，继续保持与青年技术人员的广泛联系。以唱歌为掩护，交谈时事，启发思想，促进进步，这个活动一直坚持到1948年底。为了进一步提高以公开工作为掩护，加强党的群众工作的斗争水平，经研究决定，将当时工务处一个叫做“工作与学习社”的公开团体加以利用，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活动。这个社是全国铁路工务技术人员组织的一个学术性团体，在各条铁路上都有分社，吸收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活动内容主要是交流技术经验，参观现场工地，开联欢会联络感情，受到各铁路行政技术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工务处的地下党员与进步分子均成为该社的活跃分子，通过“工作与学习社”广泛联系工程技术人员，并结识了路局一些中、上层人士。又以“工作与学习社”名义公演郭沫若的古装历史话剧《孔雀胆》，使“工作与学习社”打破了工程技术人员学术活动的圈子，走向社会。同时在地下党支部筹划下，由“工作与学习社”出面办了图书阅览室和职工夜校，以合法的名义宣传革命思想，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于是“工作与学习社”便成为地下党支部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合法阵地。图书阅览室不仅增添了《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已被查封的《文汇报》剪辑，图书室设置的收音机亦被地下党支部所利用，在一定范围一定场合收听了新华社广播。1949年4月大军渡江时，还公开收听了新华社广播的大军渡江的命令。职工夜校认真讲授文化课，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水平，任课的党员于是在工人中结交了许多朋友。课余时间，再对他们个别地进行工作，启发他们关心政治，提高觉悟。这样，夜校便成为地下党在工人中发展组织的“苗圃”。不少夜校学生后来加入了地下职工会，有的还入了党。党支部及时推广工务处的

经验。党员刘友青在会计处通过利用“粤汉铁路会计学社”进行工作,以研究学术、联络感情为宗旨,团结、教育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从中发展了3名党员。党员赵勋在铁路机厂也以积极分子王恢先等人为骨干,办起了夜校,将许多青年工人团结在一起,为党员联系群众,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提供了活动场所。

除粤汉铁路外,工委还在湘桂黔铁路衡阳西站建立了据点。通过个别联系、教育,相继发展了刘文绍、赵福禄等6名党员,并成立了支部。开始由刘秀颀,后由刘文绍任书记。西站党支部由工委直接领导,主要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学生工作是城市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工委成立后,将回到农村的6名党员调回城内,在柴埠门建立了秘密联络据点,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使学生工作在扶轮中学和道南中学的原有基础上,迅速向其他学校扩展。当时黄道奇同志在衡阳县中任兼课教师,在那里建立了据点,王继才从扶轮中学转到县中后,便在黄道奇指导下,开展了工作。湖大进步学生陈剑夫、刘爱群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被迫撤离学校,省工委把他们转到衡阳,通过革命老人谢晋介绍到平智中学任教,从此党在平智中学建立了据点。这些学校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各种学术社团,计有:民主社、巨轮社、长风社、源泉社、真理学术研究会、群力社、曙光社、野火社、蓓蕾社、译文社;在公开的社团之外,又成立了全市性的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国新民社,简称新民社,作为党的后备力量。为了迅速提高社团骨干的阶级觉悟,1949年3月,在学生秘密联络点办了两期培训班。黄道奇同志亲自到场讲课,宣讲马列主义和当前形势与任务,并吸收了新民社和扶轮中学分社的领导骨干陈玉墀、欧阳滋、文教良、赵恒等人入党。这些公开的社团都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出墙报、黑板报,有的并组织时事演讲会,宣传进步思想。在社团成员内部则学习马列著作,传阅进步书刊,传播新华

社消息，团结教育更多的青年学生，培养出一批先进分子，加入革命组织。到1949年上半年，衡阳工委同在衡阳市的其他地下党组织一起，初步把大部分中学生发动起来，从学校走向社会。扶轮、道南、县中在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的领导下，通过改选掌握了由三青团或青年党所操纵、把持的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当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发生“南京惨案”和岳阳声援学生受害的消息传来时，扶轮中学的进步学生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深夜在校区遍贴标语，表示声援。4月21日，县中的党员更以学生会名义召开群众大会，举行声援活动。通过了《告全国同胞和同学书》作为快邮代电寄发全国，并决定：①全校罢课一天，表示抗议；②发起组织学联及全市学生大游行；③举行扩大的追悼会；④张贴壁报，印发声援宣言。学生会贴出公告，宣布罢课一天。正当要组织同学上街游行时，国民党宪兵进驻学校，追查罢课发起人，并勒令学校停课，提前放假。为了避免不应有的损失，筹备学联、游行、开追悼会没有实行。其余活动，《力报》都及时作了报导，一时轰动了全市，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地下党派遣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进入新闻界，以控制和利用舆论工具，是城市地下工作的重要方面。衡阳工委对此认识是明确的，而且还对衡阳市新闻界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分析。抗日战争时期，衡阳市新闻界就比较活跃，容纳了不少进步人士，他们通过报刊宣传进步思想，在衡阳市新闻界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个历史情况对当时衡阳市新闻界仍有影响。抗日战争时期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王晨牧、王工、王佑、廖炳辉等仍继续留在衡阳市从事新闻文化工作。这对于工委在新闻界开展工作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不少同志就是通过王晨牧等同志的关系进入报社工作的。工委把适合做新闻工作的同志安排进入报社的有：黄道奇，任《弘报》主笔；李楚凡在《精诚报》工作一段后，转到《力报》任副刊编辑主任；省工委于1948年秋派张华廉来衡，进入《力报》工作；张寄庵进入《弘报》任

总编辑，1948年秋由黄道奇、李楚凡介绍入党；刘承笃到《力报》任记者，李楚凡撤离后，由刘主编副刊。1949年上期，黄道奇、张寄庵还兼过《儿童导报》社长和总编辑。实际上当时衡阳大多数报社，均有隶属关系不同的地下党员在其中担任社长、总编辑、主笔、采访部主任、副刊编辑、电务室主任等职务。

报社的地下党员在员工中开展了宣传、组织工作。1948年12月，由隶属关系不同的党员互相配合，组织和领导了全市报社员工的罢工斗争，迫使当时全市大小7家报刊停办，罢工持续长达16天，最终以恢复大米折算工价，并提高了底薪而结束。接着成立“衡阳市新闻记者互助会”，为新闻记者谋福利，为新闻出版争自由，作为团结新闻界人士的公开合法组织。通过斗争，发展了进步力量，团结了多数记者，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在控制与利用舆论工具、掌握舆论导向方面，地下党员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通过新闻采访，了解国民党的军政动向；利用版面标题渲染事态的发展；以述评的客观面目出现针砭时弊；改变电讯来源，传播新华社的一些消息；在副刊上通过专文、杂文小品宣传进步思想，对黑暗腐败行径进行冷嘲热讽。1949年4月20日，衡阳《力报》刊登声援“四·一”惨案及船山学生罢课绝食的消息震惊了反动当局。4月22日，衡阳《力报》又刊登“声援南京、岳阳惨案及县中学生昨罢课一日，发表告同胞书，痛骂刽子手”的醒目标题的消息，这就大长了人民的斗志，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党在新闻界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引起了敌特的注意。1949年5月发生了华中直属支部的党员王仲虎被捕事件，《弘报》受到敌人“火力侦察”，《力报》又受到特务搜查。经反复研究，新闻界要逐渐撤退一批干部，黄道奇为预防暴露，经省工委同意，主动撤出衡阳市并由省工委派往衡阳西乡领导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李楚凡撤离城市，前往永兴，依靠原在该地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黄启成、邓柏建立新的据点，发展进步关系，开

展群众工作和策反工作。张华廉转去东安参加对唐生智的策反工作。此时，留在《力报》社的刘承笃，仍团结编辑部人员坚持报纸的进步倾向，继续从社论、特写、消息等方面含蓄地针砭时弊，揭露蒋家王朝即将彻底崩溃的局面。王仲虎被捕后，因故人未掌握实据，经地下党员罗顺楚、陈勇为多方营救，被关押了83天后终以证据不足而于8月上旬释放，遂即转移到黄道奇所领导的部队工作。

衡阳航空站地下党支部从做好职员的思想工作着手，宣传党的政策，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并把积极分子团结起来，组织“互助组”。梁锦文还在家属中进行工作，帮助有困难的人员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从而团结了多数人员，为后来的迎解斗争打下了基础。

除在以上几个主要方面开展斗争外，衡阳工委也在文化界、邮政、金融、财税等方面开展工作。在文化界，刘国安以师范学校音乐教师的身份，与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书记周济一道，发起成立音乐研究会，吸收中、小学教师及各方面音乐爱好者参加活动，发展会员百余人，组织了乐队、合唱团，出版了《春季歌选》，传播革命歌曲。在邮局，斗争比较激烈。1949年4月，李楚凡在衡阳邮汇局、衡阳邮政局发展党员姜牧军、陈紫阳，建立了据点，开辟了新的阵地。陈紫阳首先发动平日与他关系比较密切、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从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着手，为维护职工利益，带领群众开展了斗争。通过清理工会财务，揭露了长期控制工会领导权的特务分子刘五畴贪污公款的丑闻，并书面发起罢免刘五畴改选工会的签名运动，参与签名的达到全体会员的三分之二，迫使原九理事、三监事辞职，成立工会整理委员会，行使工会的一切职权，并负责筹备改选工作。经过改选，进步力量取得了在工会的领导权。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经过个别教育和培养，先后被接收入党。1949年5月成立了支部。在金融财税方面，党员粟受祺、朱次林在上层人士中进行广泛的联系。粟受祺在复兴银行，团结全体留守职工，使该行